

# 玉米



毕飞宇 文

毕飞宇 画

毕飞宇



毕飞宇  
文集

# 玉米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米/毕飞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毕飞宇文集)

ISBN 978-7-02-010130-6

I. ①玉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4724 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3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5 插页 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130-6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自序

毕飞宇

这套文集收录了我从 1991 年至 2013 年之间的小说,是绝大部分,不是全部。事实上,早在 2003 年和 2009 年,江苏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分别出版过我的文集。江苏文艺的是四卷本;上海文艺的是七卷本;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集则有九卷。递进的数据附带着也说明了一件事,我还是努力的。

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小说不是逻辑,但是,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,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。现在我想再补充一句,在我看来,这个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“成名作”和“代表作”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意义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，他们愿意为我再做一次阶段性的小结。老实说，和前两次稍有不同，这一次我有些惶恐。写作的时间越长，我所说的那个走向就越发地清晰，——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么？——它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呢？

我写小说已经近三十年了，别误会，我不想喟叹。我只是清楚了一件事，以我现在的年纪，我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了，也做不来了。我只能写一辈子。说白了，我只能虚构一辈子。可再怎么虚构，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愿望，我精神上的走向不是虚构的，我渴望它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。

2014年6月7日于南京龙江

## 序

李敬泽

2001年4月,毕飞宇发表了《玉米》。从那时起,在文学界,人们频繁地提起“玉米”：“看‘玉米’了吗?”“你觉得‘玉米’怎么样?”局外人听来,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,地里长着玉米。

十几年前,莫言写出了《红高粱》,因为这题目和这小说,“高粱”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。从此,提起这个词,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、妖冶的绿,想起丰饶而残忍的大地。

——汉语之美、汉语之深厚和微妙,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,它被念出来,然后余音不绝,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、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。

“玉米”也是贫贱的作物。在北方和南方,在平原和山

地，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，它太普通，太常见，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：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。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，他让“玉米”有了身体，美好的、但伤痕累累的身体；他还写了“玉秀”和“玉秧”，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。从此，在“玉米”这个词里、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。

《玉米》、《玉秀》、《玉秧》，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。我估计，他原本只是想写《玉米》，最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可能并非他的初衷。但也许就在写《玉米》的过程中，他“发现”了玉秀和玉秧，这两个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后，被光彩夺目的姐姐遮蔽着。毕飞宇察觉到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可能性——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，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：要展开自己的故事，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，开辟自己的天地。

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，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“自由主义”苗头，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。所以，在《玉米》中，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。但是，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，那就是他对人、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。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着激情，跃跃欲动时，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，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，让生命自行其是。

于是，就有了这样一本书，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，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。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、强制、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“长篇小说”，它更像是一次追逐：小说家被人的自由、人的魅力所引导，欲罢不能地追下去。

所以在这本名为《玉米》的书中，我们看到的首先是“人”，令人难忘的人。姐姐玉米是宽阔的，她像鹰，她是王者，她属于白天，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；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，秘密的、暧昧的、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。玉秀如妖精，闪烁、荡漾，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寻觅、奔逃；玉秧平庸，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，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、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。

三个人，三个女人，她们生长于田野，她们都梦想远方。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、艰险，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，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、逼仄的“洞穴”；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，她们焦渴、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。

——通过对“极限”的探测，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、政治、权力、伦理、性别与性、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，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。对我们来说，读《玉米》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，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，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，绝对地具体，因确凿直抵本质。

所以，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，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；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，因为她们来自“中国经验”中最令人伤痛、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——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、在历史和生活之间，“个人”何以成立？她（他）的自由、她（他）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？我们从《玉米》中、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“人”的困难，看到“人”在重压下的可能，看到“人”的勇气、悲怆和尊严。

《玉米》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《三姐妹》，这个和《玉米》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，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。



是的,守望,守和望,守着人、望着命运,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,毕飞宇把这种姿态视为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——

我想起 2001 年初,毕飞宇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对我谈起“玉米”,这个词和这个女人,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,他爱她,她将因此而荣耀……

再往前二十年或三十年,在江苏北部的乡村,一个瘦的、黝黑的孩子,他注视着无边无际的田野,泪水涌上他惊喜的眼睛,我听到他说:“玉米。”

## 《玉米》自序\*

这本书收集了三部小说，它们是《玉米》、《玉秀》和《玉秧》。这三部作品的名字同时也是三个姑娘的名字，她们是三姐妹。我在这本书里描绘了她们的命运，她们心灵的命运、尊严的命运、情感的命运以及性的命运。这三部作品在出版之后，我就有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称号，读者们称我是冷血杀手。我不是杀手，我不是。我全部的爱告诉我，我不是。然而，这三部小说都是我写的，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，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三个姑娘推向毁灭的时候，我意识到，小说家的确是残忍的，同时也极度地艰难。在你描写人物的时候，你其

---

\* 此文亦作为《玉米》法文版序。

实就是在与人相处。你们有了感情。对一个小说家来说,这是最折磨人的:一边是你的感情,一边是你要描述的命运,你选择什么?

福楼拜说,要想让一个东西有意义,就需要久久地望着它。我只能说,我选择了久久地望着。

我在这里还想说另外的一样东西,那就是时间。这三部小说里涉及了两个时间,它们是1971年和1982年。

《玉米》和《玉秀》写的是1971年的故事。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1971年?因为1971年是“文革”前期和“文革”后期的分界。在1971年之前,“文革”基本上处在战争的状态,而到了1971年之后,战争的状态结束了,然而,情况也许更坏。战争结束了,但“文革”作为一种方式已经液化了、染红了,变成了中国的血液,我们的每一滴血都学会了仇恨。萨特说,他人即地狱。我想说的是,在某种特殊的时候,我们自己首先是地狱。

1971年我还是一个七岁的孩子。但是,我不认为一个七岁的男孩和四十岁的男人有多少区别。因为弱小,也许更敏锐。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为了表明我是天才,不是。我是说,作为一个中国的小说家,如果我的创作遗漏了1971年,我不能够原谅我自己。在《玉米》和《玉秀》当中,我并没有描绘“文革”的政治、杀戮,在中国,那样的书已经相当多了。我只是描写了一些我们必须经历的场景,那些最普通的生活,那些像吃饭和呼吸一样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。在我看来,人生的悲剧不是道路上铺满了地雷,而是有人在你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。

《玉秧》的故事则发生在1982年的校园。1982年,是“文

革”结束的第六个年头了。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已经变成了教师,那些在“文革”当中被打倒的人也已经重新回到了课堂。我想看看这些人是如何教育孩子的。我想说,这些人的教育依然在延续“文革”,尤其是那些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的人。他们在用“文革”的方法告诉孩子们:我是正确的,永远正确,而你是错的,永远错——“我”与“你”、“我们”与“你们”,依然是一种敌对的、不能兼容的人际。

我不相信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宣布“文革”的结束,我也不相信一次会议可以确定历史的进程。

中国人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,这个鬼就叫“人在人上”。它成了我们最基本、最日常的梦。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,同样依附在平民、下层、大多数、民间、弱势群体,乃至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”身上。

“人在人上”的标志是你获得了“特殊”的权力。在中国,许多批评家都认为《玉米》是一本反权力的书。我同意。但我不能同意《玉米》是一本反权利的书。相反,我拥护权利。人是有权利的,正如人天生就应当平等、自由一样。权利是生命本身,没有了权利,我们的生命将失去理由,同样也失去了依托。

因而,玉米、玉秀还有玉秧,她们是集权命运下面的三姐妹,三个没有权利的人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序 .....      | 李敬泽 | 1   |
| 《玉米》自序 ..... |     | 5   |
| 第一部 玉米 ..... |     | 1   |
| 第二部 玉秀 ..... |     | 74  |
| 第三部 玉秧 ..... |     | 164 |
| 后记一 .....    |     | 243 |
| 后记二 .....    |     | 250 |

## 第一部 玉米

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，除了喂奶，施桂芳不带孩子。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。施桂芳没有。坐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，人也懒了，看上去松松垮垮的。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，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。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，倚住门框，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。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，一只手挑挑拣拣的，然后捏住，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，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，样子出奇地懒了。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，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，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，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。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，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。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，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？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。村子里的人都说，桂芳好，一

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。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,如果正在吃饭,笑起来不方便,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。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,一连生了七个丫头,自己也不好意思了,所以敛着,客客气气的。现在好了,生下了小八子,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,身上就有了气焰。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,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,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。她的男人是村支书,她又不是,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?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,她时常提着丫杈,站在阳光底下翻草。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,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,心里说,大腿叉了八回才又出个儿子,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。

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,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。这里头还不包括掉掉的那三胎。施桂芳有时候说,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,怀孕的反应不大同,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。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,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,她就能一劳永逸了。有一次到镇上,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,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,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,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,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,听出意思来了。简单地说,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,不容易挂得住,就是挂住了,多少也要见点红。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,叹了一口气,心里想,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。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,她生不出男孩也不完全是命,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,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。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,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,愣了好大一会儿,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。

王连方却不信邪。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,

知道内因和外因、鸡蛋和石头的关系。关于生男生女，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。女人只是外因，只是泥地、温度和墒情，关键是男人的种子。好种子才是男孩，种子差了则是丫头。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，嘴上不说，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。

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。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。他下定了决心，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儿子一定要生。今年不行明年，明年不行后年，后年不行大后年。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，也不担心绝种。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。说到底，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。相反，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。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，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，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。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，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，捂着一些，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，看贱了你。嫂子用那种晓通世故的神秘语气说，要记住桂芳，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。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。连着生了几个丫头，事态反过来了，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，甚至不是半就半推，确实是怕了。她只能夹着，捂着。夹来捂去的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。那一天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，正面一个，反面一个。“不肯？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，还一顿两碗饭的！”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，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。施桂芳“在床上不肯”，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。光会生丫头，还“不肯”，绝对是丑女多作怪。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，就是怕王连方吼。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，夹也夹不紧，捂也捂不严。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，板着脸，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，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。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，一颗一颗地数起来，哪一颗不是丫头？



老天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开眼了。阴历年刚过，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。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，有要求的，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“革命化”的春节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，严禁打扑克。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。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，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。吃不准不要紧，关键是做领导得要敢说。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。王连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，一手握着麦克风，一手玩弄着扩音器的开关。开关小小的，像一个又硬又亮的感叹号。王连方对着麦克风厉声说：“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”说完这句话王连方就把亮铮铮的感叹号撇了下去。王连方自己都听出来了，他的话如同感叹号一般，紧张了，严肃了，冬天的野风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、严厉之气。

初二的下午王连方正在村子里检查春节，他披着旧大衣，手上夹了半截子飞马牌香烟。天气相当地阴冷，巷子里萧索得很，是那种喜庆的日子少有的冷清，只有零星的老人和孩子。男将们不容易看得到，他们一定躲到什么地方赌自己的手气去了。王连方走到王有庆的家门口，站住了，咳了几声，吐出一口痰。王有庆家的窗户慢慢拉开一道缝隙，露出了王有庆老婆的红棉袄。有庆家的面对着巷口，越过天井敞着的大门冲王连方打了一个手势。屋里的光线太暗，她的手势又快，王连方没看清楚，只能把脑袋侧过去，认真地调查研究。这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，传出了王连方母亲的声音，王连方的老母亲掉了牙，主要是过于急促，嗓音里夹杂了极其含混的气声，呼噜呼噜的。高音喇叭喊道：“连方啊连方啊，养儿子了哇！家来呀！”王连方歪着脑袋，听到第二遍的时候听明白了。回过头去再看窗前的红棉袄，有庆家的已经垂下了双肩，脸却靠到了窗棂口，面无表情地望着王连方，看上去有些怨。